西學東漸、絲綢之路、與國民教育

馬樹人

[摘要] 1582 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抵達澳門，把歐洲的宗教、天文、地理等知識，傳入中國，而他後來被稱為「西學東漸第一人」。但是，根據敦煌學的考據，遠於公元前一世紀左右，西方文化已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那為甚麼要待一千六百多年後的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才被稱作「西學東漸」之始？本文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絲綢之路已被歷史遺忘。今天，陸上絲綢之路正和海上絲綢之路一起被重新賦予歷史任務，而香港也被納入其中。本文將嘗試按著與這相關的幾點歷史時空轉捩點，勾畫出一個數世紀長的大故事。我們會發現，把這個故事說得越長越遠，香港便越像被淹沒在一條它掌握不了的歷史長河里。而當這個巨大的故事成為國民教育一部份，它將給香港的身份認同，帶來極大挑戰。

引言

1582 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隨葡萄牙商船抵達澳門，把歐洲的宗教、天文、地理、數學等知識，傳入中國。時為明朝神宗年間，比清朝的洋務運動早二百多年，而利瑪竇也就

被稱為「西學東漸第一人」，[1]揭開了「西學東漸之序章」，[2]乃「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第一人」。[3]

但是，根據敦煌學的考據，遠於公元前一世紀左右，西方文化已沿著橫跨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4]那為甚麼要待一千六百多年後的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才被稱作「西學東漸」之始？本文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絲綢之路已被歷史遺忘。今天，陸上絲綢之路正和海上絲綢之路一起被重新賦予歷史任務，而香港也被納入其中。以下，我們將嘗試按著與這相關的幾點歷史時空轉捩點，勾畫出一個數世紀長的大故事。我們會發現，把這個故事說得越長越遠，香港便越像被淹沒在一條它掌握不了的歷史長河里。而當這個巨大的故事成為國民教育一部份，它將給香港的身份認同，帶來極大挑戰。

從「西學東漸」到八國聯軍

讓我們把故事從公元十三世紀末開始說起吧。那時，中國已經歷唐、宋兩代，海路興起，逐漸取代絲綢之路在中國對外交通的作用。[5]到了十六世紀中，明朝政府封閉嘉峪關，邊塞居民內遷，敦煌因而被荒棄。[6]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日趨繁盛的海路上，迎來了西洋傳教士利瑪竇。這時的中國，正處於甚麼改革都會被傳統勢力消解為「毫無意義」（no significance）的明神宗萬歷年代。[7]相反地， 歐洲這時已進入了科學革命時代，科學知識湧現，

---

[1] 李韡玲，《西學東漸第一人：利瑪竇在中國》（香港：天地圖書，2010）。

[2] 黃正謙，《西學東漸之序章：明末清初耶穌會史新論》（香港：中華書局，2010）。

[3] 劉明強，《西學東漸在肇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頁 1。

[4] 陳萬雄，〈敦煌的時空〉，敦煌研究院主編，《敦煌石窟全集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頁 24。.

[5] 張倩儀，〈由無知覺到迷上了：敦煌的魅力與啟悟〉，李美賢、紀文鳳編，《立體看敦煌》（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頁 176-190。

[6] 樊錦詩，〈前言：敦煌石窟的百年傳奇〉，敦煌研究院主編，《敦煌石窟全集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頁 5）

[7] Ray Huang,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而利瑪竇所屬的耶穌會，正是強調傳教士除了要接受傳統神學訓練外，還需具備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8]。利瑪竇後來之得以晉身大內宮殿， 其中一個關鍵，正好是他給神宗獻上自鳴鐘，並懂得修理這個皇上心儀的西洋報時儀器[9]。那就是說，所謂利瑪竇是「西學東漸第一人」的說法，是把「西學」縮窄為沿著海路而來的歐洲宗教和科技文化。至於在歐洲還沒經歷科學革命前， 從絲綢之路經敦煌傳入中國的外來文化，則不被算入這「西學」之中。

無論如何，利瑪竇確是開啟了從海路而來的「西學東漸」。那時候，西方傳教士背後的教會組織，在中國並沒有甚麼政治或軍事力量。因此，利瑪竇在華傳播歐洲的科技及宗教時，總是小心翼翼，並需要考慮中國人所能接受的程度。例如他在中國繪制世界地圖時，使用的是歐洲技術，但他卻把歐洲從地圖的中央移到左邊，而把中國放在中央。他這樣做，既讓中國人了解到神州只是世界的一部份而非全部，但也避免冒犯天朝自認是世界中心的權威。[10]此外，每當天主教義與崇拜儀式與中國的傳統習俗有衝突時，他大多采取忍讓及妥協的態度，甚至容許華人天主教徒敬孔祭祖，令在華的天主教看來有點不倫不類。這便引來長達近一世紀的「禮儀之爭」，結果教廷於 1704 年禁止利瑪竇那種與中國傳統習俗相調和的傳教方式。而這時正處於康熙、雍正盛世年代的清朝政府，亦以強硬態度回應，全面禁止洋人在華傳教[11]。那就是說，自始至終，直至十八世紀初之前的「西學東漸」，並沒有觸動中國的權威。

然而，在隨後的一百多年里，中國及西方的國力發生了巨大的此消彼長。到十九世紀中，西方傳教士已不再需要如利瑪竇那般謙恭有禮地來進行「西學東漸」，而是藉著船堅炮利，把中

Haven: Th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8] 黃正謙，《西學東漸之序章：明末清初耶穌會史新論》，頁 80-81。

[9] 李韡玲，《西學東漸第一人：利瑪竇在中國》，164-191；張錯，《東西文化比較研究：利瑪竇入華及其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02），頁 11-12。

[10] 菲利浦 • 米尼尼，《利瑪竇–鳳凰閣》（王蘇娜譯）（鄭州：大眾出版社，2012），頁 112。

[11] 李韡玲，《西學東漸第一人：利瑪竇在中國》，頁 194-197。

國人眼中屬奇風異俗的西洋宗教，強行引入中國。結果，宗教、文化差異演變為暴力衝突。到了 1900 年，外國傳教士更在義和團運動中受到襲擊，最終以八國聯軍入京鎮壓告終。

而也就在這世紀之交的一年，西方探險家在中國西北萬里黃沙中，進入了莫高窟藏經洞。而我們的故事，也就要轉到這時已久被遺忘的敦煌了。

從敦煌文物流失到取得香港主權

1900 年，一名居於敦煌石窟附近的道士，無意中發現了內藏大量古代經卷、典籍等文書的藏經洞。當時的清朝政府，正處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際， 無心亦無力去處理那些尚待考證的邊塞文物。另一方面，來自英、俄、德、法、日等國的探險家，一個接一個地把藏經洞的文物運到外國，導致大量國寶散失海外。對中國來說，這與晚清連串的割地賠款，同屬難以承受的國恥。[12]

踏入民國時期，中國仍處外憂內患，列強繼續以不同方式，企圖運走敦煌文物。但是，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後，經歷了「民族覺醒」而又受過西學洗禮的中國知識份子，逐漸學懂起而抵抗外國在華的文物掠奪。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們更組織隊伍，前赴敦煌，自行發掘、保護及研究藏於那里的國寶。1944 年，抗日戰爭正酣， 民國政府只能以極為有限的資源，在莫高窟一座破廟中， 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1949 年，中共立國，新政權隨即接管敦煌文物。[13]

不久，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爆發，敦煌研究成為學術禁區。和當時中國大部份知識份子一樣，敦煌文物的研究人員都被

[12] 劉詩平、孟憲實，《敦煌百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 6-101。
[13] 劉詩平、孟憲實，《敦煌百年》，頁 216-276。

列作「反革命份子」而遭受批鬥。至於莫高窟內的文物，在國務院保護下，得以保存。[14]

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敦煌研究逐漸恢服。老一輩敦煌學者在沉寂二十多年後相繼復出，新一代接捧者迅速冒起，國內敦煌學趨於蓬勃。1997 年 11 月，一批中國專家學者，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討論有關敦煌文物從海外回歸中國的問題。[15]而就在這之前數個月，中國政府剛從英國手上，取得管治香港的主權。巧合的是，在上世紀初首批從藏經洞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被運往的正好就是英國。這既是歷史的偶然，卻好像也說明了政治與文化之間一種必然的關係。而我們的故事，到這里也就要轉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那時刻了。

從「北進想像」到「北學南漸」

1982 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試圖按英國與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一系列條約，延續英國對香港的管治，但遭鄧小平拒絕。此後經過兩年多談判，英國最終同意於 1997 年，把香港的主權交給中國。

儘管這大局已定，但在香港主權正式被移交中國前的過渡期間，中國還正在向全世界學習富國強兵的經驗，而香港則仍處於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黃金時期。在這格局下，香港出現了一股所謂「北進想像」，認為憑著它在政治制度、經濟實力、文化水平等各方面的優勢，香港將會向中國輸出其成功故事。[16]那就是說，儘管主權北移，但港人期待著的，卻是「南學北漸」。

然而，2003 年圍繞著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爭議，令香港人感到「北進」只是曇花一現的「想像」，事實則是來自北京的

---

[14] 劉詩平、孟憲實，《敦煌百年》，頁 296-307。

[15] 劉詩平、孟憲實，《敦煌百年》，頁 339-358。

[16] 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政治權力，正開始衝擊香港多年建立起來的成功基石。2004 年，約三百名專業人士，聯署《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聲稱香港的成功經驗，是體現在一些核心價值上，「它們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17]

從「北進想像」到核心價值宣言，標致著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已從「進」轉為「守」了，而這過程的背境，是中國的國勢正急促冒升。對中國領導人來說，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進入了「大國崛起」的「復興之路」。這種躊躇滿志的心態，盡顯在 2007 年兩套以此為名的官方電視紀錄片中。就在那一年，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訪港，表示香港也需像國內一樣，推行「國民教育」。所謂「國民教育」，在國際間並不多見，[18] 更沒有統一的定義。香港政府在籌劃國民教育時，則把其定義為「一種圍繞國家及建立國家觀念的教育。透過國民教育，使每一個國民成為能遵守國家法律、能照顧國家利益、能擔負國家命運的人。」[19] 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集體主義，與強調普世及個人（而沒有國家）意義的香港核心價值，可謂南轅北轍。2012 年，香港特區政府公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被批評是推行愛國洗腦教育。在強大的社會反對聲中，整份指引被擱置，香港好像守著了一條防線。[20]但就在這不久之後，一個帶著比「大國崛起」、「復興之路」更雄心萬丈，以同時打造現代海、陸絲路為

---

[17] 《蘋果日報》，2004 年 6 月 7 日。

[18] 國際間較常見的，是強調以客觀、持平態度，及民主視野來處理國家管治問題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而非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見 Ngai, S. K., Leung, Y. W. and Yuen, W.W, “The Turmoil of Implementing Nation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Social Educator* (2014, vol 32, issue 1): 5-15

[19] 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2008，附件乙，頁 1。

[20] 莊璟珉，〈從公民教育到國民教育的爭議〉，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227 (December 2013)。

己任的中國領導人，在北京登上了權力高峰。而我們的故事，也就此要進入另一篇章了。

從「復興之路」到「一帶一路」

上述的中國領導人，便是於 2012 年 11 月接任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剛上任， 習便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並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次年 9 月，他更把這個夢的內容，從中國境內擴展到一個橫跨亞、非、歐三洲的「一帶一路」構思中。[21]

所謂「一帶一路」，其中的「一帶」是指由中國內陸出發，經中亞、中東、東南歐而抵達西歐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而「一路」則是從中國沿海出發，經東南亞、南亞、北非、中東而抵達南歐的「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表示，它將主動拓展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國家的經濟合作，並牽頭興建基礎設施。整個藍圖， 共覆蓋 26 個國家，約佔全球人口 63%、全球經濟規模 30%。這個超級龐大區域體系，內藏各國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利益計算。但對中國來說， 卻有特殊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宏偉的歷史文化框架，來承載「大國崛起」、「民族復興」這中國夢。按照規劃，整個「一帶一路」工程將於 2049 年完成，那將正好是中共建國 100 周年。[22]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這宏圖下，敦煌又被賦予了新的任務。就在「一帶一路」計劃提出後不久，甘肅酒泉市即宣佈「正在將敦煌打造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國際文化旅遊名城」。[23]一名政協委員則說，敦煌是重振絲綢之路的「一張王牌，無論是舞

[21] 《香港商報》，2013 年 9 月 26 日及 2015 年 1 月 18 日。
[22] 《明報》，2014 年 12 月 23 日。
[23] 《大公報》，2013 年 11 月 25 日。

劇、歌劇，還是話劇、電影，都有很多故事可寫，而故事往往是最打動人的，可作為更好的載體在中亞國家傳播」。[24]

這名政協委員，是香港演員彭丹。她在娛樂圈外的發言，可能不會被香港人留意，而她所說的把敦煌故事「在中亞國家傳播」，對香港也好像沒有直接意義。但事實也並非完全如此。就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一批敦煌文物在港展出，展覽的主題是「敦煌–說不完的故事」。正如彭丹所言，「故事往往是最打動人的」。而只有動人的故事，才能使國民教育生效。

事實上，在中共剛剛建國還不夠一年，敦煌故事已被用作「國民教育」之用了。1950 年 9 月，北京急電敦煌，說「經中央研究決定，配合抗美援朝，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在北京舉辦一個大型敦煌文物展覽會，請速即攜帶全部敦煌壁畫摹本和重要經卷文物來京籌備為要」。[25]未有証據顯示，2014-15 年敦煌文物來港展出，也是帶有類似的政治任務。但正如上文所述，從敦煌文物於 1900 年被列強掠奪，到香港主權於 1997 年移交中國，正好是一個關於中國從百年屈辱中，重拾尊嚴的民族復興故事。而正因為這敦煌故事有其令人動容之處，它可說是國民教育的「一張王牌」。

那就是說，「一帶」的敦煌效應，可令中國有更大的「軟實力」，來對香港進行「北學南漸」。另一方面，「一路」更可能令香港需要改寫自身的歷史， 因為它給香港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香港在被英國「開埠」前，是否只是個小漁村，還是海上絲路上的一個城市？

原來，早於 2002 年，廣州、泉州、寧波等一些中國沿海城市，已開始計劃把海上絲路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項目。2005 年，香港政府曾表示會研究加入這計劃，此後便好像沒有了下文。但另一方面，國內一些沿海城市不但競相加入， 更各自爭取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26]到「一帶一路」這宏圖出現後，中國九個沿

---

[24] 《文匯報》，2014 年 1 月 23 日。

[25] 劉詩平、孟憲實 ，《敦煌百年》，頁 208。

[26] 《明報》，2015 年 8 月 10 日。

海城市於 2014 年 11 月簽定協議，共同推動「海絲申遺」，而這九個城市（北海、廣州、漳州、泉州、寧波、揚州、蓬萊、福州、南京）中，並沒有香港。[27]

然而，國內及香港一些歷史學者，均認為香港在割讓給英國時， 並非是個小漁村，而是南中國一個「重要港口」。[28]不知為何歷史如此巧合，2013 年初，就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這規劃後不久，香港在沙中線鐵路興建地盤中，發現大量宋代古蹟文物，顯示「在南宋時期九龍城一帶，存在著的並非寥寥數戶的偏遠小村落，而是有繁盛經濟活動、有系統、有間格的社區模態。基於這次的發現，香港的歷史或將有重大改寫，不再是以往位於邊陲的南方未開發之地，在合理的評鑑之下，香港的歷史，更應被置於海上絲路的總平台作考量」。[29]一時間，保護出土文物之聲，此起彼落。諷刺的是，原本以保護一些港英殖民地標 （天星、皇后碼頭）為開始的本地保育運動，就此可能被轉化為中國海上絲路建設工程的一部份，從而為國民教育提供教材。

結語：敦煌的興衰，對香港有何啟示?

以上，我們說了一個時間上跨越數世紀、地域上牽涉東西南北的大故事。這個故事，以絲綢之路的衰落開始，以「一帶一路」構思的出現而結束。在這之間的數個世紀中，其實還有其它無數的興衰故事。中國既是這些故事的其中一個主角，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講述者。它曾經因其衰落，而失去講述這些故事的主動權；今天，隨著其國力冒升，它正整合出一個宏偉的「一帶一路」大故事。對香港來說，「一帶」給香港帶來源自敦煌「說不完的故事」，而「一路」則要香港發掘自身在海上絲路上的角色。

---

[27] 《大公報》，2002 年 1 月 14 日、2005 年 8 月 24 日、2008 年 11 月 18 日、2014 年 11 月 29 日。

[28] 《大公報》，2014 年 4 月 11 日；《明報》2014 年 5 月 11 日。

[29] 《明報》，2014 年 12 月 6 日。

兩者一北一南，為中國對香港的國民教育，提供了一套壓倒性的教材，而其效力亦相信會與日俱增。如此形勢下，香港能如何自處？

一個城市，也許就如世間萬物一樣，興有時、衰有時，沒甚麼大不了。既然敦煌也曾如此，那麼它對香港有何啟示？一名香港文化工作者，在回想曾編輯一套敦煌圖冊時這樣寫道：「繁榮了一千年的敦煌留下世界級的文化遺產，但交通條件改變了，現在它這麼破落與荒涼。那麼將來的香港呢？如果交通改變，香港將來留下甚麼給後人呢?」[30]

的確，在思考國民教育這問題時，香港除了關心當下的政治忠誠及身份認同外，是否還應想想，有甚麼永恆的東西，可以留給後人？

參考書目

李韡玲。《西學東漸第一人：利瑪竇在中國》。香港：天地圖書，2010。

張倩儀。〈國際大都會 – 敦煌〉，樊錦詩、陳萬雄主編，《發現敦煌》。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頁 1-6。

張倩儀。〈由無知覺到迷上了：敦煌的魅力與啟悟〉， 李美賢、紀文鳳編，《立體看敦煌》。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頁 176-190。

張錯。《東西文化比較研究：利瑪竇入華及其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2。

[30] 張倩儀，〈由無知覺到迷上了：敦煌的魅力與啟悟〉，見李美賢、紀文鳳編，《立體看敦煌》（香港：商務印書館），頁 189。

莊璟珉。〈從公民教育到國民教育的爭議〉，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ccasional Paper* 227, December 2013。

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陳萬雄。〈敦煌的時空〉，敦煌研究院主編，《敦煌石窟全集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頁 22-25。

菲利浦・米尼尼。《利瑪竇－鳳凰閣》（王蘇娜譯）。鄭州：大眾出版社，2012。

黃正謙。《西學東漸之序章：明末清初耶穌會史新論》。香港：中華書局，2010。

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現況、挑戰與前瞻》，附件乙，2008。

劉明強。《西學東漸在肇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

劉詩平、孟憲實。《敦煌百年：一個民族的心靈歷程》。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

樊錦詩。〈前言：敦煌石窟的百年傳奇〉，敦煌研究院主編，《敦煌石窟全集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頁 5-10.

Huang, Ray. 1981.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gai, S. K., Y. W. Leung, and W. W. Yuen. “The Turmoil of Implementing Nation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Social Educator* (2014, Vol. 32, issue 1): 5-15.

[ABSTRACT] In 1582, the Italian priest Matteo Ricci arrived in Macao, and brought to China European knowledge in religion, astronomy, and geography. Subsequently he was called “The first person to disseminate Western Knowledge to the East”. However, according to Dunhuang studies, as early as around the 1st century B.C., there were disseminations of Western culture to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 Then why was the arrival of priests like Matteo Ricci to China over 1,600 years later called the beginning of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to the East”? This article will argue that, this is because by that time the Silk Road had already been forgotten by history. Today, the land Silk Road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ogether are given a new historic mission, and Hong Kong is being absorbed into it. Based on some related historical time-space junctures,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map out a several-centuries-long mega history. We will find that the longer and farther this story is, the more likely Hong Kong would seem to be drowned in an unmanageably long stream of history. When this mega history is made part of national education, it will bring grave challenges to Hong Kong's identity.